

編後語

在知識份子的各類反思中，他們對自身群體思潮的變化及社會功能的反思，可能是最有意味的。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選登一組文章，正是試圖從思想史與知識社會學的角度，重新檢討十多年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一些重要爭論。許紀霖認為，80年代具有「態度同一性」的新啟蒙運動本身潛藏着內在分歧，這種分歧在1989年之後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逐漸激化，導致了「啟蒙的自我瓦解」，但當今思想紛爭背後仍然存留着啟蒙思潮的共同印記。劉擎則試圖揭示近年中國知識場域中「思想」與「學術」的虛假分裂，指出它是當前學術生產的「形式主義專業化」以及公共思想討論中派別分裂的癥結所在。而高力克從現代性角度梳理中國「自由主義與新左派」思想爭論，雷啟立分析後現代與後殖民論述興起及其演變過程，以及成慶評介學界「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的觀點分歧，都可以看到，這些爭論是出於知識界的現實關懷，對中國急遽轉型社會狀況作出不同診斷、應對以及對未來可能性的不同構想而引發的。對照這組總結二十世紀90年代中國學術思想轉型的評論文章，應星一文則談今天中國知識界面臨的新問題。他指出，雖然官方媒體嚴厲批評「公共知識份子」思潮，但我們更應該反思大學體制下公共知識份子所面臨的困境：在向「研究型大學」進軍和「與國際接軌」旗號下，在爭設博士點、爭研究基地和課題分贓時，這些學者是否意識到他們與公共生活的通道已被切斷？當前，在威權政治和市場邏輯的雙重壓力下，公共知識份子又如何堅持理性、獨立與德性？

近年來，憲政問題是知識界的一個思考熱點。本期王人博通過描述中共領導人在「五四憲法」制定過程中的主導性和意圖，來揭示憲法的中國特色。數十年來，憲法與中國民眾生活幾不相關的現象，近年來開始出現變化。陳弘毅的文章分析指出，儘管2004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對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一系列修改有某些進步可喜之處，但在國體理論上和人民實質權利上都沒有突破；揭示「齊玉苓案」和「孫志剛案」所帶出的創立違憲審查機制等憲法學議題，並思考把憲政發展作為中國政治改革關鍵環節的可能進路。當今農民進城打工引起的一系列問題，是源於中共建國初期確立的城鄉二元體制。以往本刊發表了不少有關對農村基層體制變遷的研究，而今期陳輝和郭聖莉兩位年輕學人的文章，則是介紹建國初期中共如何推動建立控制城市基層社會的城市居民委員會，以及居委會的組成和社會功能。

相比較於以上有十分實際面向的文章，本期兩篇涉及歷史話題的文章，也十分值得一讀。孫隆基以廣闊的視野，由西向東環球考察公元一千年前後除新大陸以外當時的所有文明，他指出，當今世界格局都可溯源於此，其中三大宗教對文明的形塑威力尤為明顯。今天，恐怕只有歷史學者才知道，新村運動曾經影響了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一整代知識份子。董炳月探訪今天日本新村的現況及人物，——它們沿襲八十餘年前由武者小路實篤創立的新村，至今仍在吸引某些人投入這個帶有烏托邦色彩的人間最後綠洲。